

唐代人口问题 研究

冻国栋 著

人口问题乃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考订历史上繁杂的人口资料，厘清历史上的人口升降、分布、迁移及管理状况，揭示人口发展规律，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冻国栋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165/13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

冻国栋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 1/32 15.625 印张 插页 3 400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50（内含精装 200 册）

ISBN 7-307-01446-7/K·128 (平)

ISBN 7-307-01447-5/K·129 (精)

定价：(平) 8.60 元

(精) 11.30 元

(鄂) 第 9 号



冻国栋 1957年10月生，河南舞阳人。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1983年）、硕士（1986年）、博士（1991年）学位。1986年留校执教，1988年6月任武汉大学历史系讲师，1991年6月任副教授。著有《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等书，并发表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人口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文数十篇。

序　　言

人口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某一时期人口数量的升降、变动及其分布状况的具体研究，可以衡量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探寻人口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人口迁移的考察，可以了解人口迁移的诸般因素、时代背景以及对人口地理、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对于人口结构的探讨，不仅可以弄清各该时期人口家庭结构的基本类型、发展线索，揭示人口的性别比例、生殖率、死亡率、阶级结构、职业结构等相关问题，而且还可据以获知不同时代的人口政策、赋役制度对人口、家庭结构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样，对于人口统计的研究，不仅可以探明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统计的对象、范围、程序和限度，还可以为当今的人口统计提供某些历史的借鉴，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科学。因而本课题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促使作者围绕唐代人口问题进行探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唐代人口诸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30年代。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日学术界曾围绕本论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为本稿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由于唐代人口是一个复杂的、包容面十分广泛的课题，而且资料较为零碎和缺乏，因而相对唐史研究的其他领域而言，仍显得十分薄弱。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唐代前期，而对于中晚唐时期的人口问题甚少涉足。若干论著虽也曾予以关注，但多系笼统叙述，一笔带过。因而存在着不少的空白点。

二、研究的领域有较大限度。比如与本课题相关的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之间的差异，南北方不同地域内人口发展的差异、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人口政策等大都缺乏系统而具体的研究。

三、资料的搜集十分有限。大量正史、诗文、碑刻墓志以及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未及全面搜集或充分利用。

四、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也并非全无剩义可言。即如学术界讨论较多的人口逃亡、籍帐登录、唐前期人口分布变迁的研究、地志户口资料系年的考订等，仍没有取得或者说没有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不少值得修正和补充之处。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鞭策我们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继续就唐代人口进行一番通盘性的探讨：

——唐代人口数量的升降究竟是怎样的？各个不同阶段人口的变动尤其是唐中后期人口具有什么样的情状？

——如何看待官方的户口统计数据，这个统计数据与实有人口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导致这个差异的原因何在？

——唐中期以前以及以往的时代人口的分布格局是个什么样的态势，唐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得以形成的脉络及其原因是什么？唐各地区间人口的分布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对古代中国乃至当代人口的分布具有何种影响？

——唐代人口迁移的形式、对象、阶段、移出区和移入区怎样？人口迁移对于当时的人口地理分布、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唐代的人口迁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唐代家庭规模结构的基本形态怎样？影响家庭规模变动的诸因素是哪些？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沙州、西州地区的人口结构具有什么样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为唐代人口结构提供了

什么样的例证？一般民户的户均口数、性比例结构、丁中比例、阶级结构、生殖率与死亡率以及人口寿命究竟怎样？

与此同时，本文还力图在时间上上推下延，通过对汉晋以来以至五代宋初人口诸现象发展演变的描述进而揭示唐代所具有的历史特征。

除此之外，我们还始终认为：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基本史料和相关资料的收集、鉴别、考订至关重要，因而除行文中着力搜罗新的资料并加以考订之外，还以专章分析了唐有关地志户口资料的系年、登录范围及其史料价值等问题。

我们还认为，人口问题的专题研究与人口史并不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而本稿在撰写过程中并没有包括问题的全部。有的领域我们完全没有涉及，有的问题虽然提到，但未及展开讨论，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只是试图仅就以上几个方面的探索，为唐代人口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某些初步的意见和可资利用的史料。当然，就我本人的学力和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就以上问题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疏漏乃至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因而恳切地期待着学界师长对本稿提出严正的批评。

作 者

1991年5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唐有关地志户口数字系年及其史料价值分析	(1)
第一节 《通典·州郡典》州郡与户口系年(附校勘)	
.....	(1)
第二节 《元和郡县志》户口数字系年及史料价值	(7)
一、《元和志》的缺佚情况简说	(7)
二、《元和志》开元户数系年推測	(9)
三、《元和志》元和户的大致年份与统计范围	(12)
四、《元和志》户口数字的史料价值	(15)
第三节 两《唐书·地理志》所记户口数字的分析	(16)
一、旧唐志旧领户的统计年份与统计地域	(16)
二、关于两唐志天宝户口数的记载	(18)
三、两唐志天宝户口数字的可靠性问题	(2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概观	(26)
第一节 魏晋时期著籍户口的减耗及其原因	(26)
第二节 东晋南朝的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	(41)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的荫户问题与人口数量	(56)
第四节 隋代编户数量的增长及相关问题探讨	(71)
一、隋代户数的增长与“大索貌阅”的时限	(71)
二、隋代南方的著籍户口	(79)
本章小结	(84)

第三章 唐代人口的升降状况	(90)
第一节 著籍户口升降概述	(90)
第二节 各阶段著籍户口的升降状况及其特点	(97)
一、唐初人口的锐减与逐渐回升	(97)
二、安史乱后著籍户口的普遍减耗	(103)
三、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的人口	(106)
第三节 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之间的差异	(113)
第四章 唐代人口分布	(126)
第一节 唐以前人口分布大势	(126)
一、两汉时期人口分布一瞥	(126)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分布	(127)
三、隋代的人口分布	(143)
四、唐以前人口分布的特点	(146)
第二节 唐代人口的分布格局及前后期的演变	(148)
一、唐初人口的分布	(148)
二、唐天宝年间的人口分布	(153)
三、中晚唐至北宋初年的人口分布	(158)
第三节 唐代各地区人口分布的具体考察	(166)
一、关内道	(167)
二、河南道	(171)
三、河北道	(178)
四、河东道	(182)
五、陇右道	(187)
六、山南道	(191)
七、淮南道	(198)
八、江南道	(203)
九、剑南道	(215)

十、岭南道	(222)
本章小结	(228)

第五章 唐代人口迁移	(240)
第一节 唐代有关徙民的限令与官府所组织的移民	(240)
第二节 唐代士族、官僚及士大夫的迁移	(259)
一、士族的迁移	(260)
二、一般官僚士大夫的迁移	(264)
三、士族、官僚士大夫迁移的特点	(278)
第三节 一般民户的自发迁移	(280)
一、唐前期一般民户的自发迁移	(280)
二、中晚唐一般民户的自发迁移	(289)
第四节 唐代人口迁移的影响	(295)
本章小结	(331)

第六章 唐代的人口结构	(344)
第一节 唐以前家庭规模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344)
一、汉晋南北朝一般民户家庭规模结构	(344)
二、豪族、士大夫的家庭规模结构	(352)
三、家庭规模结构上的南北差异	(354)
四、隋代的家庭规模结构	(357)
第二节 唐代的家庭规模结构	(359)
一、一般民户的家庭规模结构	(359)
二、官僚、士大夫的家庭规模结构	(374)
第三节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前期西州地区的人口结构	
一、唐太宗贞观年间至高宗末期西州的人口结构	(379)
二、武后、中、睿宗时期西州的人口结构	(392)
三、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西州的人口结构	(402)

四、唐代西州人口结构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结论	(419)
第四节 敦煌文书中所见唐沙州地区的人口结构.....	(424)
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代沙州的人口结构	(425)
二、玄宗天宝时代沙州的人口结构	(434)
三、大历四年手实中所见唐沙州的人口结构	(447)
 结 语.....	(459)
附录一 《通典·州郡典》所记天宝元年户口数统计	(464)
附录二 两唐志天宝十一载户口数校勘表.....	(475)
 后 记.....	(489)

第一章 唐有关地志户口数字系年 及其史料价值分析

第一节 《通典·州郡典》州郡与 户口系年（附校勘）

《通典·州郡典》保存有一组唐代较为完备的州郡户口数字。考释这些数字的相对年份对于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市原亨吉二氏在《唐代的行政地理》一书之《序说》中对《通典》州郡建置的年代曾有过推断，认为“《通典》州县的记述，多是天宝初年（742）之事。”¹1986 年，翁俊雄先生专文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根据两《唐书·地理志》重新考察了《通典》州郡户口数字的系年，认为平冈、市原二氏的推断仍然不十分具体，《通典》之州郡建置和户口数字系年应为开元二十九年（741）。²随后，刘海峰先生撰文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同样根据两《唐书·地理志》，驳翁文开元二十九年说，认为《通典》的数字是根据天宝元年（742）的计帐而来。³由于《通典·州郡典》未标明属何年份，加之州郡建置杂采天宝元年前后的记录，因而为其年代的断限从而充分利用这批资料带来许多困难。平冈、市原先生之说对于判断《通典》州郡、户口数字的年代甚有启发，但未及展开论证，且未涉及户口数字问题，翁、刘二文根据两唐志的记载比较《通典》州郡建置从而得出户口数字系年的意见各有其理由，但仍有值得补充和修正之处。

笔者曾根据王溥监修的《唐会要·州县改置》的记述，参考两《唐书·地理志》考察了《通典·州郡典》州郡、户口数字的大致年代。考察的结果我们发现：

第一，《通典》州郡建置的年份以天宝元年（742）为准。如《通典》（以下简称《典》）卷173麟州新秦郡条，下自注云：“天宝元年置新秦郡，或为麟州。”《唐会要》卷70麟州条：“开元十二年置，十四年废，天宝元年复置”；《典》卷180淄州淄川郡，《唐会要》卷70淄州条：“武德元年置，六年废，天宝元年复置。”另如漳州之漳浦、龙岩二县，并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置，《典》卷181自注详记此事，唯“岩”作“严”，《唐会要》卷71同，龙岩县一名杂罗县。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不拟备举，仅由麟、淄二州及漳州之漳浦、龙岩二县之例来看，《通典》所记乃是天宝元年复置时事。

第二，州县名称多以天宝元年八月改制前后为准。如《典》卷173京兆府宜寿县，《唐会要》卷70盩厔（今为周至）县条：“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宜寿县，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改为盩厔县。”《通典》所记为改制后的名称。《典》卷173泾州灵台县，《唐会要》卷70泾州鹑觚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灵台县”（《典》本条自注称“天宝中改此”，恐误）；《典》卷173庆州延庆县，《唐会要》卷70：“白马县，同上敕改为延庆县”；《典》卷173延州延昌县，《唐会要》卷70延州罢交县：“贞观十年于罢交镇置县，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延昌县。”以上都是遵用天宝元年新改县名之例。为便于说明这一问题，兹将《通典·州郡典》载古雍、梁、荆河、冀、青、扬诸州下改置后的县名参考《唐会要》、旧唐志诸书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通典·州郡典》关于各州县名称的记述，大多以天宝元年八月改制前后为准。当然也有例外，如庆州合水县，天宝元年改名（《唐会要》卷70），《通典》仍沿旧称作蟠交

表 1—1 《通典·州郡典》天宝元年新改县名一览表

州府名称	辖县旧称	天宝元年 改易的县名	《通典》卷数	备注
京兆府	盩厔县	宜寿	173 古雍州	
泾州	鶡觚	灵台	173 古雍州	
庆州	白马	延庆	173 古雍州	
鄜州	伏陆	甘泉	173 古雍州	《唐会要》作坊州甘泉县。
延州	罢交	延昌	173 古雍州	
延州	金城	敷政	173 古雍州	
绥州	上县	龙泉	173 古雍州	
兰州	金城	五泉	173 古雍州	
河州	安昌	凤林	173 古雍州	
金州	黄土	渭阳	175 古梁州	
渠州	始安	渠江	175 古梁州	《典》作流江，疑“流”即“渠”，此据《会要》改。
璧州	太平	巴东	175 古梁州	《典》作“东巴”，此据《会要》。
蓬州	安固	良山	175 古梁州	
忠州	清水	桂溪	175 古梁州	
荣州	大牢	应灵	175 古梁州	
利州	义清	允山	175 古梁州	
遂州	唐兴	蓬溪	175 古梁州	
巂州	可县	西泸	175 古梁州	
姚州	长明	南泸	175 古梁州	《典》作“泸南”，今从《会要》。
陝州	桃林	灵宝	177 古荆河州	
陝州	河北	平陆	177 古荆河州	
亳州	桑县	蒙城	177 古荆河州	
曹州	离狐	南华	177 古荆河州	
唐州	上马	泌阳	177 古荆河州	
邓州	新城	临湍	177 古荆河州	
邢州	柏仁	尧山	178 古冀州	
赵州	大陆	昭庆	178 古冀州	
定州	唐昌	陘邑	178 古冀州	《典》仍旧称“唐昌”。
易州	遒县	容城	178 古冀州	
易州	永乐	满城	178 古冀州	

州府名称	辖县旧称	天宝元年改易的县名	《通典》卷数	备注
泽州	濩泽	阳城	179 古冀州	
并州	石艾	广阳	179 古冀州	
齐州	山茌	丰齐	180 古青州	
齐州	禹城	祝阿	180 古青州	《典》“祝阿”作“高唐”。
蕲州	兰溪	蕲水	181 古扬州	
蕲州	永宁	广济	181 古扬州	
光州	安乐	仙居	181 古扬州	
润州	曲阿	丹阳	181 古扬州	
湖州	临溪	德清	181 古扬州	
越州	永兴	萧山	181 古扬州	
饶州	新昌	浮梁	181 古扬州	
虔州	南安	信丰	181 古扬州	
建州	兴吴(先后改为武宁、唐兴)	浦城	181 古扬州	
福州	万安	福唐	181 古扬州	
福州	温麻	长溪	181 古扬州	
泉州	清源	仙游	181 古扬州	
漳州	——	漳浦	181 古扬州	漳浦、龙岩并天宝元年新置。“龙岩”《典》作“龙严”，今从《会要》。
漳州	——	龙严(岩)	181 古扬州	
汀州	黄连	宁化	181 古扬州	

县；定州之陉邑县，系天宝元年改名，《通典》仍作唐昌县。不过这类事例甚少，基本上是遵用改制后的县名。

第三，凡天宝元年以前的州县建置沿革大都有所记述。如《典》卷 177 所记邓州南阳郡之菊潭县，据《唐会要》卷 71：“菊潭县，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置”；《典》同卷随州汉东郡之唐城县，《唐会要》卷 71 称：“唐城县，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典》卷 178 莺州渔阳郡，自注云：“开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莺州，或为渔阳郡”；卷 174 洮州临洮郡，《唐会要》卷 71 洮州条：“开元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废临州

为洮州”；明州余姚郡，《典》自注云：“本会稽之鄮县，大唐开元中分置明州。”《会要》卷 71 明州鄮县条：“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置”；又《典》卷 182 汀州临汀郡条，自注云：“历代土地与长乐郡同，大唐开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为临汀郡。”由此可以相信，《通典》州郡系年之上限应在开元末和天宝初。

第四，《通典·州郡典》若干州郡的建置和两唐志一样（详见下文）兼采天宝元年以后的记载。如京兆府之昭应县（《典》卷 173 古雍州上）、襄州（《典》作“襄阳州”）襄阳郡之宜城县（《典》卷 177 古荆河州）并为天宝七载（748）新改的县名（《唐会要》卷 70 京兆府昭应县条、卷 71 襄州率道县条）。苏州吴郡之华亭县（《典》卷 182 古扬州下）乃是天宝十载（751）新改的县名（见《唐会要》卷 71 苏州华亭县条，《旧唐书》卷 40《地理志》江南东道·苏州下辖六县无华亭之名）。此外，像宣州之太平县和宁国县（《典》卷 181）等也都是采用的以后新改的名称（具见《唐会要》卷 71）。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州县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才设置的。如《典》卷 181 古扬州上所记之池州秋浦郡，是永泰元年（765）十月分宣、饶、歙等州户口新置（《唐会要》卷 71 州县改置下江南西道池州条，《旧唐书》卷 40《地理志》江南西道池州条）之州。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记述唐州县系年基本上以天宝元年为主，其中虽杂有天宝元年以后新置或新改州县的名称，但毕竟是少数。《通典》的作者杜佑编撰此书长达 30 年以上，至贞元十九年（803）始上于朝廷，其中杂采天宝以后新出现的州县名以充足《州郡典》也是不难理解的。从总体上看是以天宝元年为基准的，而且是比较地把握了这个原则。

《通典·州郡典》之州郡建置系年既以天宝元年为准，其户口数字系年应与此相当。我们不妨将《通典》各州郡分计户口总数与两唐志的户口数字进行比较，推论其年份之先后问题。

《通典》以古九州划分郡目，并分列户口数，为便于比较，兹将《通典》古九州按十道划分，重新组合统计。《旧唐书·地理志》（简称“旧志”）之十三道、《新唐书·地理志》（简称“新

志”）之十五道亦一并按十道计算，列表如下：

表 1—2 《通典》、两唐志所记各道户数统计

道别	《通典》户数	旧唐志户数	新唐志户数
关内	765 235	810 263	815 998
河南	1 747 864	1 795 539	1 850 588
河东	625 235	632 611	630 511
河北	1 559 709	1 514 765	1 556 858
山南	472 755	576 883	640 657
淮南	390 617	412 448	418 674
江南	1 813 542	1 824 004	1 817 618
陇右	123 093	112 874	138 228
剑南	873 556	922 353	851 707
岭南	329 963	336 052	356 691
合计	8 701 569	8 937 792	9 077 530

* 旧唐志绛州户缺，河东道各州府分计总户数为 547 311，据新唐志，绛州户 82 204，补之，则全道户数应为 632 611 户。《典》辽、石两州无户数，旧唐志云州户数有误，仅 73 户，新唐志作 3 169，《典》作 3 160 户，参见附表。

** 旧唐志河北道深州户数有问题：户 18 825，口 346 472 万，新唐志同。户均口数高达 18.4，殊不可能。《典》作 48 857 户，估计两唐志首位数有误。

*** 旧唐志岭南道之泷、浔、罗、牢、粤、芝、万安等州无户口数，崖州的户数有误，仅 113 户，应以新唐志 819 户为正。

据上表，《通典》诸州郡总户数为 8 701 569，以此数字与两唐志所载天宝户数（两唐志户口数系年见下）相比，旧志为 8 937 792 户，新志为 9 077 530 户，旧志户数比《通典》户数多 23 万余户，新志户数更较之多出 30 余万。这还只是个粗略估计，由于旧唐志有 40 余州不计户数，若干州的户数又有讹误，若考虑到这个因素，则较《通典》的数字恐还要多一些。再将《通典》的数字与开元末期的户数相比，据《旧唐书》卷 38《地理志序》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共有户 8 412 871，显而易见，《通典》的户数又较开元二十八年的户数为高。按照唐前期户口增长的一般规律，